

夏春涛 著

太平天国宗教



太平天国宗教

夏春涛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南京

FN86/11

太平天国宗教

夏春涛 著



(苏)新登字第011号

太平天国宗教

夏春涛 著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校内)

南京工程兵工程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印张10 字数 251千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305-01545-8/K·114

定价：6.00元

责任编辑：范瑜

目 录

序一

序二

引 言 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在华传播概况

第一章 上帝教的创建…………… (12)

第一节 从屡试不第到皈依上帝…………… (12)

第二节 出游广西与上帝教的问世…………… (21)

第三节 拜上帝会性质的转变…………… (28)

——兼论上帝教与中国民间宗教的融合

第二章 上帝教教义概述…………… (40)

第一节 “上帝”…………… (40)

第二节 “魔鬼”…………… (64)

第三节 “天堂”、“地狱”…………… (78)

第四节 综论…………… (86)

第三章 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 (上)…………… (88)

——太平天国对《圣经》态度的演变

第一节 “当今真道书”…………… (88)

第二节 “约书有讹当改”…………… (98)

第四章 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 (下)…………… (111)

——《旧约》、《前约》的出版及《真约》

的问世

第一节 “朕来乃是成约书”…………… (111)

第二节 “爷哥下凡立真约”…………… (143)

第五章 洪秀全与洪仁玕宗教思想之比较…………… (154)

第一节 《摩西五经》与上帝教…………… (154)

第二节	洪仁玕对上帝教教义的修正和补充·····	(167)
第三节	原因试析及评价·····	(179)
第六章	上帝教与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	(189)
第一节	“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及其宗教伦理观···	(189)
第二节	独尊上帝与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	(206)
第三节	“天下一家”理论与太平天国的对外观念···	(230)
第七章	上帝教在太平军中及民间的传播·····	(249)
第一节	太平军与上帝信仰·····	(249)
第二节	上帝教在民间·····	(273)
附录	参考书目举要·····	(309)
后记	·····	(318)

序 一

王 庆 成

1979年5月在南京举行的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德国魏克特博士作了题为“对洪秀全基督教信仰的一些看法”的发言，其中说：“1976年回到中国后我最早的访问之一就是去广东花县，看看洪秀全的住宅、乡村学校的校舍和那里的博物馆。我发现博物馆里根本没有提到洪秀全的宗教思想，这使我感到惊讶。”又说，“看到洪秀全所领导的运动的宗教方面在最近期间并未被完全忽视，我很高兴，……这一方面似乎尚应受到更多的注意。”

魏克特博士是一位学者、作家，当时他虽担任联邦德国驻华大使，但对太平天国史有研究、有兴趣，和我们常有联系，提供过关于太平天国的德文资料。他对中国史学界的友谊是令人感动的，他在那次讨论会上的上述发言更使我有深刻的印象。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有其宗教的方面是无疑的。太平天国宗教的主要源头是西方的基督教，同时又揉合了当时中国民间宗教的成份，有其独特的内容。它对太平天国的兴亡、对太平天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和外交等方面都有影响。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忽略了这一方面。从1979年编的“太平天国史报刊文章索引”中，我们见到自1949—1978年数以千计的各类大小文章，只有极少数谈到太平天国宗教。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想主要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偏差。我国史学界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后，正确地否定了以太平天国为宗教革命、种族革命的看法。但这不应导致回避或否认宗教在这次运动中的存在。回避它，或者以为它只是如同陈胜、吴广起义时篝

火狐鸣之类的事，就会陷于对太平天国理解的简单化，限制对太平天国研究的深入。承认宗教、民族等因素的存在，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研究、分析它们，同确认太平天国运动的农民革命性质是不矛盾的：相反，只会使我们对这次运动本质的认识更深入、更丰富。

太平天国研究和有关的文物、博物馆工作十几年来日益改善和发展。我本人从1978年起的几年中，对太平天国宗教作了若干研究，曾有志于撰写一本较完整的关于太平天国宗教的书。但从1985年后一直陷于行政工作和各种杂事，研究时断时续，蹉跎了已经不多的大好光阴。1988年夏春涛同志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我担任他的导师。夏春涛同志曾师从祁龙藏、董蔡时同志，对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史有较好的基础，英文水平不错，可以阅读研究太平天国宗教所必需的西文资料。在我的建议下，他经过三年苦读和研究，以《太平天国的宗教》为题写成了近20万字的博士论文，得到论文答辩委员会和近代史研究所学位委员会的较好评价。他在委员会各位前辈学者的鼓励和启发下，又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对论文修订补充成书，现在即将正式出版。这使我感到特别的欣慰。

《太平天国宗教》全书七章。首章论太平天国宗教即上帝教的创立过程及上帝教中的中国民间宗教成份。第二章分析上帝教教义，概述上帝教关于“天堂”、“地狱”、“上帝”、“魔鬼”等概念的内容。第三、四章研究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的关系和异同，重点是上帝教对新旧约圣经的态度，突出了上帝教和洪秀全宗教思想的独特性。第五章比较洪秀全、洪仁玕的宗教思想，研究洪仁玕对上帝教教义的修正。第六章分别讨论上帝教对太平天国的社会理想、国际观念的影响，上帝教同太平天国否定儒学的政策的关系。第七章论述上帝教在太平军中及在民间的传播。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宗教方面，需要避免单纯地就宗教谈

宗教，需要通过对太平天国宗教的研究来认识太平天国的思想和历史。概括本书七章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对太平天国宗教的本身，和太平天国宗教对太平天国思想和政策的影响，都作了比较充实的研究。我相信，本书对太平天国研究的深入是一项有价值的成果。

太平天国宗教的研究是不易的。既要研究太平天国，又要熟知宗教，而史学工作者一般对宗教、宗教史、宗教经典缺少足够的知识。过去曾把太平天国与16世纪闵彩尔领导的德国农民战争相类比，因为两者都有宗教色彩。这是对太平天国宗教和闵彩尔运动与宗教的关系都没有研究造成的误解。最近日本太平天国史专家小島普治教授撰文，论证了两者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外古今事件表面相似是常有的，但其性质可能不同，需要分别作出具体的研究。历史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族等多方面的现象。史学研究者不可能熟知各门社会科学，但需要尽可能借鉴、利用研究这些现象的社会科学知识，才能使史学研究走向丰富和深入。在近代史学界，十几年来开拓和发展，说明我们正走在这条道路上。我希望夏春涛同志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努力作出贡献。

1992年5月4日

序 二

祁龙威

1982年春，予始以太平天国史学教授研究生，十年已逝，初有成业者共得九人，江都夏春涛其一也。春涛美秀而文，年方冠，从苏州大学来同学。晨夕相随，予与语顾炎武、戴震等考证之功，春涛辄能心领神会，举一反三，所作《吟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史料探源》、《太平天国服饰考》等，皆言前人所未言，为太平天国史学发展辟蹊径。1986年夏，予挈之入都门，谒罗尔纲先生等当代硕彦，览故宫档案等典籍，春涛益奋发有远志。旋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事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君庆成，学大进，得博士学位。今年初，予从海外万里归国，春涛正返江都探亲，携其近著来扬为予七旬祝嘏，握手论学，载笑载言。春涛读中外书，好深湛思，所著囊括“上帝教”始末，精心涉虑，为学术界长期聚讼之案作结。殊可嘉矣！

当代开拓太平天国史学之耆耆大师，推萧一山、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此诸老者，皆硕大而声宏，为士林造福无量。群贤继起，各专一曲，或论军事，或考外交，或志人物，或探经济，著述如林，近年有人遂谓太平天国史学已经终结，已无课题可供青年研究，其实不然。予以为，学无止境，或集大成，或补罅漏，或启新途，倘能刻苦深入，都尚大有可为。观夫春涛此作，益证予说之非谬。预期春涛等青年一代，必将恢宏萧、郭、简、罗诸大师之余绪，将太平天国史学推上新高峰。

1992年3月于扬州

引言 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在华传播概况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 3 大宗教。它起源于公元 1 世纪的巴勒斯坦，是古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宗教的混合产物。基督教的正式经典称作《圣经》，由《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构成。《旧约》沿自犹太教，原称作“约书”，取义于上帝通过在西奈山向摩西传授圣诫而同以色列人订立了约法。基督教兴起后，称上帝已通过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与人类订立了新的“约”，故将基督教形成后编写的经典称作《新约》，称沿自犹太教的那部分经典为《旧约》。

基督教信仰上帝耶和华和救世主耶稣，认为由圣父（上帝）、圣子（基督）、圣灵构成了三位一体。其中，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属于纯灵，没有具体的形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由圣灵感孕玛丽亚降世为人，具有完全的神性和人性；他是圣父启示的传达者，宣传救世的福音，为替世人赎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度降临人间，对世人实施末日审判。圣灵则运行于世界和人类之中，使人知罪、悔改、成圣。基督教宣传原罪说，称人类自始祖亚当起即因偷食禁果而犯了罪，故人生来就有罪，并在罪中受苦；但人不能自身解脱苦难，只有信仰上帝和基督，才能获得赦罪和拯救。基督教将社会上的种种弊端均归咎于每个人内心的“罪性”，强调博爱、宽恕、忍耐等观念，声称善者将升入天堂得永乐，恶者将沦落地狱受永苦。

基督教自公元 1 世纪问世后，逐渐流传于奴隶制社会的罗马

帝国，并于4世纪初被其奉为国教。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基督教也随之分裂为东、西两派。公元1054年，两派正式分裂。东部希腊语地区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自称“正教”，即东正教；西部拉丁语地区教会以罗马为中心，自称“公教”，即天主教。中世纪时，基督教成为西欧各国封建统治的支柱，基督教神学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公元16世纪，西部教会内部发生了反对教皇封建统治的宗教改革运动，并陆续分化出脱离天主教会的宗派，如路德宗、加尔文宗等，称作“新教”（Protestant）。新教后又不断分化，形成众多的派系。

基督教早于唐初即传入中国，时称“大秦景教”，属东部教会内部的一个小教派——聂斯托里派。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该派僧侣阿罗本（Olopen，7世纪）经丝绸之路来到长安（今西安）。唐太宗延其入宫询问教义。3年后，唐太宗降诏准许景教在华传播，并在长安义宁坊赐建了1座大秦寺。此后的200余年间，唐朝皇室基本上对景教持赞允态度，景教遂得以在华立足、发展。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镌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朝天启年间出土）记载了当时的盛况。可惜好景不长，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诏令禁止佛教流传，拆毁天下寺庙，勒令僧尼还俗，遂殃及景教。至此，景教在华的传播便告一段落，一部分景教徒避难至蒙古等地。

元代中叶，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又死灰复燃。元代在华的基督教有两个教派，一是流行于蒙古、中亚等地的景教；另为罗马天主教。由于基督教徒均崇奉十字架，故元人将这两派统称作“十字教”，称信教者为“也里可温”^①。因此，元代的基督教又被称作“也里可温教”。元世祖对各种宗教持兼容并包的态度，景

^①蒙古语，意为“有福缘之人”，见诸《元典章》及元代的一些碑刻。

教遂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而卷土重来，复鼎盛于一时。当时，景教教堂分布大江南北，尤以扬州、杭州、泉州等地为盛。罗马天主教的入华也始于这一时期。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方济各会会士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ia Montecorvino，1247—1328）以教皇特使名义抵汗八里（汉名大都，今北京），觐见元成宗，获准在京传教。后来，其传教范围逐渐由元都向南方扩展，教徒日众。然而，在华的基督教两派因教义歧异而互相倾轧，且均与中国本土的佛、道诸教磨擦激烈，颇受排斥。上述因素阻遏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势头。元朝灭亡后，也里可温教也就随之绝迹。

16世纪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时代。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魔爪染指东方，传教士们也纷至沓来。当时，天主教的耶稣会（葡萄牙派遣）、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斯定会（以上为西班牙派遣）等各派相继遣使来华传教，内以耶稣会的影响和势力最大。由于明朝政府厉行海禁政策，最初来华的各派教士均被迫滞留于澳门或上川岛，无法进入大陆。明神宗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改换僧服，自澳门潜入广东肇庆，揭开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第3阶段的序幕。

为了使天主教能够在华立足，利玛窦尝试以融通儒耶和介绍西方科技的方式传教。于是，他学汉语，穿儒服，习《四书》、《五经》，谨守中国礼仪，广交名士，宣称儒家学说与天主教教义有相似之处，中国经书上的“上帝”或“天”即天主教所说的“天主”（God），并引士大夫为援攻诋敬奉偶像的佛、道两教；同时，广泛介绍西方的数学、地理学、天文学、机械学等方面的知识。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利玛窦至北京觐见明神宗，呈献天主圣像、自鸣钟、雅琴、《万国舆图》等物，获准长驻北京传教。利玛窦在京约10年，病歿后由朝廷赐葬于京师。

阜城门外。经过利玛窦在华约30年的惨淡经营，天主教终于逐渐在华渗透开来。当时，名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俱信奉天主教。继利玛窦之后，汤若望、毕方济、南怀仁等后期来华的传教士也颇受青睞，获准在13省中自由传教。明朝灭亡后，传教士们仍然受到礼遇。汤若望在清世祖顺治年间被封为钦天监监正，奉命与南怀仁等制订历法。清世祖还在宣武门内赐建了1座天主教堂，并亲书“钦崇天道”匾额。继位的康熙皇帝则任用传教士绘制《皇舆全览图》，充当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谈判的译员。康熙年间，全国计有28个城市设有教堂，教徒达10余万人。

但是，绝大多数中国士大夫对来自异域的天主教仍然充满了敌意。明、清两代，由明神宗时南京礼部侍郎沈澹和清世祖时钦天监杨光先相继发难，发生了两次贬斥天主教的风潮，均以天主教暗化王化、弃绝人伦为由。这两次反教风潮使得大批传教士被逐或被捕，天主教在华事业因此而两度受挫。17世纪中叶，在华天主教各派又发生了内讧，多明我会、方济各会抨击耶稣会允许中国教徒祭祖祀孔的做法。自1700年起，这场礼仪之争逐渐升级为康熙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冲突。教皇指责耶稣会的行为，令其改弦易辙；康熙则表示支持耶稣会，诏令将干涉中国习俗的传教士驱逐出境，后进而宣布禁止西洋人在华传教。继位的雍正皇帝继续实行禁教政策。乾隆年间，清政府正式闭关自守。在此过程中，教皇也于1773年下令解散耶稣会。于是，已在华传教近2个世纪的耶稣会终于寿终正寝。其它修会也严重受挫。

俄罗斯正教（东正教）的传入也始于清代。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雅克萨之役的俄国战俘被押至北京。康熙下令将其编为1佐领，另将城东北隅胡家园胡同的1座关帝庙拨给他们作为祈祷场所。20余年后，彼得一世正式派遣俄罗斯正教传教团赴华。传教团在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成为常设机构。由于当时俄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范围仅局限于

北京，加上两国间的边境尚还相安无事，因此，肇始于康熙年间的礼仪争执事件并未波及到俄罗斯正教。

总之，在19世纪以前，基督教曾3次以较大规模传入中国，即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以及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但它们终是无根之花，相继凋谢。明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东方监督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 1538—1606）数度进入中国内陆未逞。传说他曾在澳门遥望中国大陆，发出绝望的慨叹：

“磐石呵，磐石，你何时才能开裂，欢迎吾主啊！”^①这一惨痛的呼声从17世纪一直传到19世纪，当基督教新教的第1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 Morrison, 1782—1834）牧师踏上中国大地时，这块名叫中国的磐石似乎越来越坚硬了。

清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25岁的英国青年马礼逊抵达澳门。当时，清政府颁布的《防范外夷章程》禁止非东印度公司的外国人居住在广州。为了传教，马礼逊被迫于2年后加入该公司。他最初的布道、翻译工作受到中国官吏的监视和天主教神父的排斥，处境艰难。于是，马礼逊被迫将翻译、印刷《圣经》的工作迁至远离中国本土的马六甲（Malacca）进行。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新约全书》译毕，次年在广州出版。后来，马礼逊又和第2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米怜（W. Milne, 1785—1822）合译《旧约》部分，于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9年）译毕，同年在马六甲出版。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马礼逊和米怜翻译的新、旧约全书在马六甲合并出版，取名为《神天圣书》（Hole Bible），计21卷，是为中国第1部汉译《圣经》。此外，马礼逊还撰成中国第1部英文字典《华英字典》，并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和报刊。此间，马礼逊的长子、妻子和密友米怜相继辞世。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马礼逊在广州病逝，

^①K.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1929, P.91。

遗体葬于澳门。

继马礼逊开创了基督教第4期在华传播的局面后，伦敦布道会及其它国家的新教教派又陆续派遣传教士来华布道，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F.A.Gutzlaff, 1803—1851）、郭士立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Rev.W.H.Medhurst, 1796—1857）、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 1801—1861）一同致力于改进《圣经》译本的工作。约在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左右，郭士立译本《旧遗诏书》（Old Testament）、《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New Testament）先后刊行于世。

总的来说，基督教新教在华的传播依然遇到重重阻力，难以立足。但是，这种局面很快便被鸦片战争（1840—1842）的炮声所打破。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规定英国人可以在5个通商口岸及香港自由传教。不久，美、法两国分别通过《望厦条约》、《黄埔条约》攫取了传教和建立教堂的权利。于是，磐石般闭关锁国的中国顷刻间被敲开了6个天窗。传教士们凭藉不平等条约和坚船利炮的庇护，纷纷涌入中国传播“福音”，而且，不少传教士直接或间接地效命于本国政府在华的殖民扩张事务，从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在此背景下，郭士立于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在香港创立“汉会”（The Chinese Union，一称“福汉会”），专事训练华人入内地散发《圣经》等布道工作。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I.J.Roberts, 1802—1871）一度是郭氏的主要助手。至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该会信徒已达1800人。郭氏《圣经》译本也得以在广东等地流传。^①

总而言之，从马礼逊来华到40年代，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播的

^①E.P.Boardman, *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2, PP.43—44.

中心初期远在海外，即东南亚的马六甲一带；后期虽移至中国本土，但也主要局限于5个通商口岸及香港，真正的中国内陆基本上并未接触到基督教。另一方面，中国人崇拜偶像的习俗，儒家华夏文明至善至美、夷夏之防等观念的影响，均顽强地阻遏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势头。西方列强虽用枪炮强行撞开了中国的门户，却未能同时以“福音”敲开中国人的心灵。不少中国人接受了西方的鸦片，但却拒绝接受上帝信仰。因此，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并没有能够使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处境改观多少。

然而，“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①马礼逊等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当初远涉重洋浮槎来华所毕生追求的传教事业，居然会在日后被嫁接出另一番“收获”——一位广东农村的中国士子吸收并改造了基督教教义，从而创建了一种新型宗教，并最终以上帝旗帜号召无数信徒揭杆而起，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①《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459页。